

第一章 编辑工作与编辑人员

第一节 编辑工作及其重要意义

新闻编辑工作是新闻业务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伴随着第一张报纸的问世而开始的。进入近代、现代以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新的新闻媒介不断诞生，不仅有报纸，而且有了广播、电视，现在又有了因特网。新闻编辑工作的范围随之有了很大的扩展，工作方式也发生了相当的变化，但其基本的东西差别并不大。相对来讲，报纸的新闻编辑工作内容要更为广泛和复杂一些。

新闻编辑工作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政治。一张报纸，特别是一张党报，宣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方针是它的一项基本任务。但是，这些能否准确地得到体现，关键要看编辑；编辑部的意图能否得到很好的贯彻，也要看编辑；记者的劳动能否得到最佳的体现，同样要看编辑；广大读者的愿望能否最大限度地得到反映，还是要看编辑；报纸办得是否精彩，最后仍然要看编辑，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辑。这是一个被无数事实反

复证明了的基本结论。

但是，同样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是新闻编辑工作的重要性远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首先，从新闻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大学新闻院系的课程安排来看，很长一个时期内新闻编辑课的教学在时间分配上就比其他课程少，有的新闻研究生课程甚至一度基本就未开编辑课。原因可能有多种，但其对学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简单地说，就是很多毕业生都不想做编辑，尤其是夜班编辑。学生的想法一般是，毕业后第一要当记者，第二做专业部的编辑，第三勉强可当群工部的编辑，第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考虑当夜班编辑。这对于编辑部的队伍建设是很不利的。但是，不管你大学重视不重视编辑课教学，现实的情况是明摆着的：报社的主要工作是编辑；编辑部的大部分人要做编辑；当记者，当评论员，但最后差不多又都回来当了编辑。不过，现在各大学的新闻编辑课教学，都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加强。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

其次，在很多报社编辑部及其他媒介编辑部，重记者、轻编辑的现象仍然是存在的。不久前，一家省委机关报出台了新的改革措施，集中到一点，就是以记者为中心，一切其他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为此二级部门进行了改组，分配政策也作了调整。笔者在总编室做夜班编辑的时候，就曾有一位部门负责人对我说：你们总编室要那么多编辑干什么？部主任也不需要那么多。夜班实际上也就相当于工厂的“装配车间”，有了零部件，组装一下就可以了，关键是要有好记者，要写出好稿子。

正因为不少同志认为当编辑很容易，勾勾画画就可以了，因此在配备人员时往往把有经验、有实力的同志调去当记者，把年轻人或业务差些的安排当编辑，于是出现了“大记者”的稿子只好由“小编辑”修改的尴尬事。

轻编辑、重记者造成的结果是：大家都争着当记者，不愿当编辑。认为当记者立即可以报上有名，令大家很快了解他，很光彩；有了作品，有了几篇好稿，评专业职称也容易。而做编辑，常年坐冷板凳，虽然勤勤恳恳，在加工稿子上花了很大的力量，但成果却是别人的，为他人作嫁衣，无名无利，既屈才又吃亏，很难拿出多少自己的作品，评专业职称也难。所以现在一些报社编辑部里，很多专业部的编辑有名无实，把主要精力用来写自己的稿子，很少去编别人的稿子，更少去编来稿。这是不少报纸编辑质量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轻视新闻编辑及其工作是违反办报规律的。我曾经和有的同志开玩笑地“争论”过：你们老说记者比编辑重要，那为什么报社的负责人叫“总编辑”而不叫“总记者”呢？为什么报社统管业务的部门叫“编辑部”而不叫“记者部”呢？为什么读者给报社写信，抬头写“编辑同志”，而不写“记者同志”呢？国外的报纸编辑部，对编辑的要求往往高于对记者的要求。比如日本的很多报社就规定，要当编辑，必须先当几年记者。我国解放前的一些报纸编辑部也有类似的规定。老报人徐铸成先生曾介绍过当年《大公报》、《文汇报》的用人情况：一个大学生到了报社后，一般总是让他先去做“外勤”（即记者）然后从中挑一些比较优秀的回来做

“内勤”（即编辑）；过一段时间再挑些有培养前途的人去做“外勤”，最后从中选择确实优秀者回来做要闻版编辑。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现在的做法也基本上属于这种类型。编辑的地位很高，而记者就不同了。即使是“高级记者”，也被认为是“跑街的”，多数人不是编辑部的固定工作人员。这有点类似于我们有些报社的“通讯员”制度，只要你写的稿子被采用了，就署上“本报通讯员”的名号。北京一家大报的总编辑不久前到香港办事，香港的同行们看了他的名片后非常吃惊：你都已经是一家著名报纸的“老总”了，怎么才是一个“高级记者”？显见两地认识上的差距有多大。

当然，轻视记者是不对的，但轻视编辑更不对。要办好报纸，没有记者不行，没有编辑更不行。一张报纸的水平如何，自然与记者的水平有关，但最后却取决于编辑的水平。何以见得？笔者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新闻编辑工作及其重要意义。

一、是对报纸及其新闻传播活动的总设计

任何一张报纸的创办都有着鲜明的目的。报纸不仅要符合传播者自身的需要，而且要满足各类或特定的读者的需要。这里有个设计的问题。设计分不同的层次，既有战略设计，又有战术设计，还有战役设计。一般说来，战略设计指的是宏观的设计、长远的设计、大政方针的设计，比如编辑方针的制订就属于这种设计。编辑方针是办报方针在编辑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编辑人员在编辑报纸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战术设计往往是指中观的设计，较长时期、较大范围

的报道设计，比如年度计划的制订以及类似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悼念邓小平同志逝世、香港和澳门回归等报道计划的制订，等等。战役设计更多的是指微观的设计，具体报道计划的设计，比如一个典型报道计划的制订，或者一个版面的设计，等等，大体都可归入其中。上述层次的设计是相辅相成、互相联系、缺一不可的。而要完成这些设计，又非编辑莫属。

当然，不同层次的设计者是由不同层次的编辑扮演的。比如，制订编辑方针的工作，一般总是由报纸的决策者，即编委会和总编辑来承担；而报道计划的制订，则往往是由相关的编辑部主任执行的，也有的是在分管编委的指导下完成的，重大一点的还要报编委会批准；至于组织稿件、指挥记者，选择稿件、设计版面等，基本上是由编辑组长或版面主编完成的，当然还要得到相关上级领导的认可，少数重大稿件的组织、重要版面的设计，报社负责人也会直接参与。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把不同层次的编辑看成是一个整体，那么，说编辑是办好报纸的设计师，或者是对报纸及其新闻传播活动的总设计，是十分贴切的。

二、是对大量新闻稿件的再创作

编辑部每天都要从不同的渠道收到大量不同的稿件。对记者（作者或通讯员）来说，这些稿件基本上可以说都是成品，有的甚至是相当不错的成品。但是，对编辑来说，这些稿件又只能是素材，因为他的“成品”是一张完整的高质量符合编辑部意图的报纸。这就要求编辑必须对来稿进行选

择和加工，而后者就是我们所说的“再创作”。当然，这种“再创作”是有限度的，不能随意添加，更不能改变事实。

新闻编辑对各类新闻作品的再创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对单篇稿件进行“加工和强化”

如前所述，编辑应该比记者“高出一筹”，否则，他对收到的稿件就很难把握好，既不能发现稿件的问题（这里指的主要还不是一般的疏漏），也难以使稿件的内容得到升华，形式得到完善。我们说编辑应具有“点铁成金”的本领，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要求。另外，由于所处岗位不同，编辑的大局意识、政治意识、责任意识等，一般也要强于记者。这就决定了编辑对记者的稿子进行加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编辑修改稿件，涉及的方面很多，如订正事实、深化主题、润色文字，等等。长期以来大家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但是，一些很有经验的编辑近来在加工稿件时，又有一些新的尝试，比如，为了深化新闻稿件的主题，他们并没有对原稿进行大增大减、大涂大抹，而是采用在文前或文中加插“编者按”的形式；为了使稿件增加一点文采，编辑只是在适当的地方写上几笔自己经历的事情，或者增加一点历史文献中的相关资料，等等。以上做法这几年在《人民日报》上屡屡出现，它不仅点破了稿件中潜在的东西，增加了吸引力、感染力，而且基本上保留了作者的原稿风格，效果非常好。

再一点就是“找由头”和“搭窝”。大家都知道新闻报道是时间的“易碎品”，有些稿子本身相当不错，但由于时

过境迁，报纸就不好再用了。还有些稿子看上去事情较小，却很有新意，但由于受到某种“规格”的限制，在一些严肃的大报、尤其要闻版上也难以刊出。要使上述“死稿”变“活稿”，让“小稿”上大报，编辑就得想些办法，而且主要不是采取对稿件本身进行改造的办法。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1997年春，《人民日报》组织了十几个记者采写了一组共9篇的稿件，主要讲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在思想观念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总题目叫《东部的转变》。可是这一年大事特别集中，这组稿件无法按原计划在一版头条集中推出。眼看快到9月份了，党的十五大马上就要召开，再登这样的稿子似乎也不大合适，可十五大以后登更不行，为此当时大家都有点失望。再有，这一年的5月2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人民日报》经济部的同志着重从经济工作的角度，撰写了《最大的国情》、《无悔的选择》等5篇稿件，但同样找不到好版面推出去，上下直着急。

时机终于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人民日报》马上开设“展示新成就 迎接十五大”的新栏目，但现有存稿的分量显然不能与《人民日报》的牌子相称。于是编委会的领导同志临时决定，把上述两组稿件纳入新专栏之中，分为“学习篇（学习江泽民同志的讲话）”实践篇（“东部的转变”），又加了个“成就篇”，连续在一版显著位置、多数为头条刊出。这组稿件取得的异乎寻常的效果是事先未曾想到的，中央领导同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新华社有一位部主任

对《人民日报》负责人说，《人民日报》最近发的一组述评“棒极了，读了让人信服”；海外有的媒体还在头版头条刊登反应文章；三组报道尚未最后登完，中央一家出版社就来约稿，要求出单行本。这件事说明“找由头”是多么的重要，且同时说明编辑人员必须要有很强的应变能力。

前几年，《人民日报》开设的“顺手拈来写变化”、“我看改革十八年”专栏，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办的“凡人新事”专栏，使得一些看似非常不起眼的小事和平凡普通的劳动者的事迹，不仅上了党中央的机关报，而且上了要闻版，有的甚至上了一版头条，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这里充分体现出的就是编辑工作的“搭窝”价值。

编辑即使对某一单篇新闻稿件进行加工，有时也不能就稿改稿，而要考虑整个版面以及整张报纸的需要，这就难免要进行“强迫性”删削，甚至还要改变稿件原有的体裁，等等。

巧妙运用编排手段，使某篇稿件变得重要起来从而扩大影响，是编辑人员进行“再创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1995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新闻，题为《一位母亲强烈呼吁 扫黄打非不可手软》（以下简称“呼吁”稿），讲的是苏州一位普通女工此前不久给江苏省副省长、苏州市委书记杨晓堂写了一封信，举报苏州宝碟公司“制黄”盗版毒害她儿子的事，在社会上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读者纷纷打电话或写信，称赞《人民日报》的报道“强烈反映了人民的呼吁”^①；说出了读者的心里话^②；表明了党和政府坚决开展‘扫黄打非’的决心”。当时中央正在召开全国

省、区、市委宣传部长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接见会议代表时说，看了《人民日报》发的这篇报道，催人泪下，谁都有儿孙，谁也不愿看到他们堕落。国务院总理李鹏也称赞此稿。

这条新闻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呢？不可否认与当时的背景有关。当年中央开展冬季“扫黄打非”，有些地方和部门的负责人认识不到位，措施不得力，工作一时未能打开局面，“呼吁”稿无疑起到了突破口的作用。再一个因素可能是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本身所具有的权威性。

但是，更直接的原因，应该归结为《人民日报》的编辑对这篇报道所做的罕见的突出处理。具体地说就是：（1）放在头条位置；（2）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警惕“电脑犯罪”》；（3）全文文武线（粗细并行的双线）加框；（4）新闻的主体部分，也就是举报信内容，全部加大字号并改成黑体。对于一篇普通的读者来信，如此集中地强化运用了众多编排手段，这在《人民日报》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这样的事实，即：此稿并非《人民日报》的“独家新闻”，而是新华社发的通稿，好多报纸都及时刊登了，为什么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呢？处理方式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比如新华社自己办的报纸《新华每日电讯》当天虽然也登了，但只放在了三版的中间位置。当然，《人民日报》的编辑之所以要突出处理这篇报道，既是考虑到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同时也是有意识地发挥了党中央机关报的特有优势，三者是互相联系、合而为一的。

2. 对多篇稿件进行“组合和搭配”

对不同的稿件实行不同的组合，将一篇稿件与不同的稿件搭配，往往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这就是报纸编辑学所讲的“版面语言”的一种巧妙运用。这种组合和搭配不仅是报纸“发言”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为编辑人员对稿件进行“再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编辑人员对稿件进行组合和搭配，特定情况下还能起到非常特殊的作用。老报人徐铸成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件事：解放前夕，他主政《文汇报》的时候，有一次编辑把“中央社”发的一条稿子扔入字纸篓里，他拾起一看，原来是国民党军方人员公祭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消息，徐就加了一个标题：《戴笠精神不死！》，照发下去，并把它拼在国民党压制工潮和绑架学生等新闻旁边。这种编排意味深长，读者看后可以产生很多联想，国民党的官员们看了也只能哭笑不得。

为了配合我国的外交斗争，编辑人员在处理国际新闻时也常常采用这种编排方式。1980年3月18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刊发了一条消息：《苏联宇宙飞船同航天站对接》。在它的旁边，编辑以同样的字号字体，登载了一条《利比亚驱逐一名苏联外交官》的新闻。两稿格式一样被编成一组。这样，细心的读者就会发现，这并不是简单的两条科技新闻和政治丑闻，而是编者借以揭露苏联加速发展空间技术的目的，是和它争霸全球一样，妄图争霸太空。

1998年春，印度瓦杰帕伊政府逆世界潮流而动，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进行了多次核试验，国际社会予以强烈谴责。这时他们又不顾事实地说什么，之所以要进行核试验，

是因为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威胁，这一下使得好不容易得到了改善的中印关系又复杂化了。印度政府的所作所为显然也不符合印度人民的根本利益。迫于国内外的压力，印度总理首席秘书不得不对记者说，印度要与中国改善关系。第二天，也就是 5 月 22 日，《人民日报》在国际版刊登了这条消息，但同时又刊登了另外一条消息：《印度试射多管火箭》。两稿并列在一起，标题大小、字号、字体完全一样。在这里编辑没有发表一句议论，但读者看后肯定会想到一个问题：印度要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宣示，到底有多少诚意呢？

对于上述两件事情，我国政府没有发表声明，报纸也没有发表评论，但是，编辑人员通过在版面上巧妙的组合编排所发表的“看法”，其所起到的作用却是独特的，是声明和评论不能替代的。

上述编排方式可不可以用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呢？原则上应该是可以的，而且处理得当还会有很好的效果。比如，2000 年 1 月 20 日，《讽刺与幽默》（人民日报社编辑出版的旬刊，专门刊登漫画、小品等）第二期的头版，上半部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赵忠祥和倪萍的漫画像，脑袋是两人的本体照片，其他部位却是漫画戏装，每人手拿两个话筒在表演，两人头部中间的空白处有三个字：“年年见”；头版下半部是一首打油诗，题目也是三个字（但很大）：“有点烦”。就内容看，上下两稿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可是由于编者把它们巧妙地组合在了一起，读者一看就会心地笑了：原来它是在善意地批评中央电视台没有大胆起用新人。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们今天所处的办报环境与过去已

经完全不一样，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大量属于人民内部性质，因此，编辑人员在采用这种编排方式时，一定要注意看对象，一定要掌握好分寸，不能简单地照搬前人在特定情况下采取的特定做法。在这个问题上，强调“政治家办报”就显得特别重要。我们过去犯的一些错误，其中包括政治性错误、导向性错误，多少都与此有关系，教训应该说是十分深刻的。当然，也有一些错误的产生是因为某些编辑人员不大了解上述编排方式的特点，《人民日报》1999年8月28日第八版的版面就属于这种情况。对此人民日报社的主要领导同志有一段批示：“看了今天八版的版面，心里很有点不是滋味，上面是批李洪志的，特大字标题《骗子+无赖》，下边是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写的纪念方志敏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丹心映日月 铁骨励后人》。两篇文章都写得不错。但这样的版面安排，不很妥当。方志敏同志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气节永垂史册，光照后人，是共产党员的楷模。他的遗作《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教育和影响了千千万万的青年和革命者。我们年轻时都读过，感人至深。这样一位先烈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章，如何处理好，是许多读者关注的。当然，批李洪志的文章也很重要，文章也有分量，也应安排好。我想，这两篇文章最好不放在一个版上，如果只能放在一个版，那也应把纪念文章放上边。是不是规定‘视点’（笔者注：《人民日报》一个专栏的名称）的文章都一律放上边？如果有这种规定，也应根据当天稿件具体情况灵活处理。”

这说明，编辑人员对稿件进行组合、搭配这种“再创

作”必须建立在准确地理解它的特殊含义，熟练地掌握它的操作技巧的基础上。否则，效果将会适得其反。

三、是对报社内外各项业务的集大成

编辑出版高质量的报纸，是报社各项工作的中心环节，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以编辑部的工作为例，直接以编报为劳动对象的人员就有记者、评论员、检查人员、校对人员、资料人员、图片和电讯接收人员、广告和发行人员、照排技术人员，等等，还不包括为它提供行政、后勤保障的大量工作人员。这些同志的工作处于不同的环节，其任务是具体的，又是分散的，但他们的工作无一不同编辑工作发生关系，也就是说，只有编辑工作才能把以上各项工作衔接起来。如果再具体考察一下上述每个环节的工作，我们就会发现其本身也是分散的。比如记者，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他们的劳动成果是一篇篇稿子，但要把这些稿件集中起来编成版面，也只有编辑才能做到。

其实，报纸的编辑出版，光靠报社内部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依靠报社外部人员的共同努力。试想，如果没有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的广大读者、作者提供大量的各类稿件，没有有关方面提供不同的服务和帮助，我们的报纸能够办得下去吗？但是要把这些人员及其力量组合起来，还得依靠编辑。

这一切说明，编辑工作不仅是一项串连的工作，而且是一项合成工作，总起来说，就是一项社内社外、方方面面各类业务的集大成的工作。

当然“集大成”并不是简单的“归大堆”。由于编辑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业务工作，编辑人员还必须有强烈的“把关”意识。如前所述，编辑人员不仅是报纸编辑出版的前期“设计者”，而且是中期“组织者”，同时也是最后“把关者”。他们既要把政治关，又要把事实关，还要把文字关。无论什么问题 and 差错，如果说在前面各个环节出现后还有人帮助纠正的话，那么只要通过了编辑这一关就无可挽回了。报纸编辑，尤其是夜班编辑，如同足球场上的守门员，扑住 99 个“点球”是应该的，一旦漏掉一个就麻烦了，甚至是“大麻烦”。编辑工作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节 编辑人员应有的主要素质

对新闻编辑人员的素质要求是由报纸编辑工作的性质和作用决定的。由于处在办报体系中的“轴心”位置，扮演着信息传播的“中介”角色，编辑人员既要对上（编辑部）负责，又要对下（各类稿件）把关；既要接受别人（记者）的传播，又要传播于别人（受众）。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不仅要参与谋划决策，而且要负责组织协调，同时要收集信息反馈，因此，没有较深的修养和较高的素质，是绝难完成其光荣使命的。

编辑人员应该具备哪些主要素质呢？关于这个问题，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已有基本共识，各家的说法也大同小异。晚唐诗人秦韬玉有一首诗，题为《贫女》：

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
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
敢将十指夸针巧，懒把双眉斗画长。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这首诗写得很精彩，但反映的情绪是低落的，可能与诗人的身世有关。他应进士不第，后从僖宗避乱到四川，在宦官田令孜府中当幕僚，田荐他官工部侍郎，特赐进士及第。该诗借“贫女”之口，倾诉作者的抑郁心情，对当时社会不合理的现象表示不满。诗的最后一句“为他人作嫁衣裳”至今还被广泛引用，不少人认为新闻编辑扮演的正是这种角色。不过，笔者却已由认同而有了新的认识，这主要应该归功于“实践”这位老师。下面就以笔者1997年初写的《乐为他人作嫁衣——一个夜班编辑的业务报告》（有删节）为基础，来阐述编辑人员应有的主要素质。

我和夜班编辑工作似乎有一种难解的缘分，其过程可以概括如下：由开始不愿意干到后来觉得可以试试；由陌生到熟悉，再到喜爱，到执著，到入迷……

十几年来，我在这个岗位上的体会是：头脑要清醒，选稿要公道，业务要过硬，精力要集中。

一、全力做好本职工作

我的夜班编辑生涯，是从1983年8月来人民日报社以后开始的。1989年7月起任《人民日报》要闻版（当时叫综合版）主编。

有人说，夜班编辑人员“日入而作，日出而息”；“起三更，落半夜”，生活反常，乾坤颠倒……其实何止这些。由此带来的后果更是多方面的。就个人来说，长期夜班（包括节假日）造成的身心疲惫，局外人难以想象；尤其糟糕的是，它使得人体的许多功能提前衰退，尤其是眼睛。本人辛苦还在其次，主要是给家庭带来了很大麻烦……

然而，自从进入夜班编辑的角色以后，我却安之若素，乐此不疲：哪怕再辛苦、再缺觉，晚上一到办公室就精神抖擞；也从未因家庭或个人的事影响过工作；……

有人说，夜班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其实“作嫁衣”也是工作，而且要有功夫；“选购布料”“剪裁加工”，一般的人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做得了吗？

1. 选稿、约稿

夜班编辑的工作首先是选稿、约稿，实际上相当于裁缝“采购布料”，它是编好报纸的物质基础。这里仅靠新闻价值标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大局观念、政治意识。1991年12月6日，新华社播发了一篇通稿，题为《每千人中有6人异地兴家立业 我国人口迁移规模正趋于增大》。文中以一种肯定的赞赏的口气说，城市是迁入热点，京、沪、津净迁入率最高；边疆是迁出大户……我看了稿子以后，第一印象觉得这是新闻，实际情况也可能就是如此。但脑子里紧接着打了个问号：这样的新闻能不能报？我们过去一直强调要控制大中城市规模，多发展小城镇。这应该说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华社现在发这样的稿子，难道又有什么新的背景？我把这个想法报告了值班编委，得到明确的支持。最后经请示

有关负责同志，决定此稿不用。现在看来，这篇稿子当时如果登出去，其影响和副作用都可能是难以预料的。

其余的工作当属“剪裁加工”的范畴，包括编稿、作标题、版面安排等。

2. 编稿

编稿是夜班编辑每天大量的工作，也是最琐碎的工作。对此，我的态度始终坚持如下两点。

(1) 尊重作者，保留风格，只能“锦上添花”，不能强加于人，更不能“无事生非”。

这是我多年来通过观察和体验得出的一个结论。我曾在好几个场合，不止一次地听到一位老编辑说，他常常把别人的文章改得只剩下一个逗号。说话者是作为经验介绍的，而我听后的感觉却十分复杂。我做新闻工作以后，撰写的稿件不多，更少“得意之作”。但自认为写作态度还是十分认真的，每一篇都不轻易出手，有的还要反复推敲，力求有些特点。但“出笼”并非都很顺利，有的稿子“不见了”的恰恰是那么一点“得意之笔”，有的甚至是“伤痕累累”。每当出现这种情况，痛苦的心情难以言表。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有时还要找有关人士“理论”几句，结果不仅得罪了人，而且也不管用。我终于发现，这并不简单地是某一个编辑对待某一个记者的问题，而是一个带有较普遍性的问题。据说有的记者的“遭遇”比我还要“惨”得多，而且几乎所有的记者都有一肚子的“苦水”。有的人对“别的编辑”哪怕是领导随便改动自己的稿子很恼火，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要将其恢复过来，比如当自己被改的稿子可以在自己编辑的版